

新常态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研究

常青青

(西安外国语大学 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人均收入突破4 035美元,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较高的收入并没有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尤其是我国的经济近年来增速放缓,经济下行,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存在着增长动力不足、人口比例失衡、产业布局不均等诸多不利因素,对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了更多的困难。通过使用计量分析模型,对经济增长、人口因素以及产业结构三大因素进行回归,得出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于提高人均收入具有正面的效应,但是人口因素以及产业布局失衡对人均收入的提高具有负面效应,并由此提出新常态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路径。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人口;产业布局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9)05-0067-09

改革开放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均10%的增长速率,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2007年时,经济增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14.16%;2010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2015年,经济总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辉煌的历史,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使得中国的经济环境开放、包容;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脱贫攻坚政策的坚持下,我国有望到2020年初全面消除贫困,建成小康社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2010年我国人均收入为4 382美元;到2015年,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8 016美元,远远超过了“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标准”(4 126美元)。可喜的是,我国已稳步迈入中等偏上经济体的行列;可忧的是,我们也一样面临着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的发展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00美元左右)后,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 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 045美元至4 125美元之间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4 126美元至12 736美元的国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2 736美元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1950年以来,在世界上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已有35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中亚洲国家有3个,分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与此同时,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亚洲国家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日本用了15年(1966—1981年)时间,人均GDP从1 000美元左右跃升到10 000美元左右;而这一历程,韩国用了将近18年的时间(1976—1992年)。对此,世界发展银行用“东亚奇迹”予以了高度评价。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升

收稿日期:2019-01-11

作者简介:常青青(1990-),女,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公共政策、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E-mail:serenaqq19@126.com。

级。许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之后,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人均收入都一直在6 000美元以下徘徊。例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国家已经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的经济一直处于低谷。中国的经济也不例外,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存在一些负面情绪。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有些人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不可避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许多国家确实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难以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仍然有一些经济体能够顺利实现转型。“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命运,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国有能力、有决心克服这个障碍,争取更好的发展。

一、文献综述

自从世界银行在2006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以来,虽然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却是一个现实问题。当前,学者们对于中国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学术文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辜胜阻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发展没有新动力、经济失去活力、贫富差距加深、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升级^[1]。马晓河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之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紧迫的任务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新兴产业的发展^{[2]132-135}。周文等认为,中国应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宏观政策和收入分配改革,从而克服“中等收入陷阱”^[3]。金立群认为,所谓的“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一种均衡状态,也就是说,在一些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些因素的不可持续性,从而人均收入会停滞不前^[4]。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往往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失效。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张楠

认为,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增速告别了两位数数字增长,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存在许多不利因素,例如高耗能产业比重过高、人口结构不尽合理等,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更多困难与挑战。只有改善人口结构,发展信息消费产业,振兴传统产业,才能克服老龄化,转变经济增长动力,激发产业活力^[5]。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杨文进等认为,目前以美元来计算人均GDP增长率高于以人民币计算的GDP增长率,这会使得,中国国际相对成本的上升和相对竞争力下降。这些表现在企业收支上,也就是成本的提高与收入的减少;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国际收支逆差增加、外汇储备减少,因此极大可能落入“发展陷阱”^[6]。李炜光提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面临着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就业率下降、人口与自然环境矛盾不断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等尖锐的问题和矛盾。而劳动人口的迅速减少、税制改革的滞后和不可避免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说明中国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7]。马岩在总结世界各国跨越“收入陷阱”的基础上指出,城市化过度、贫富差距过大、政府资源配置不合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错配等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8]。蔡昉认为中国社会因为老龄化的不断加深,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红利优势逐步消失,使得人口因素成为限制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9]。楼继伟指出,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时,由于劳动成本上升,传统行业的竞争力减弱,需要依靠创新来发展前沿技术,这些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10]。

总的来说,中国是否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一个未知数。本文希望通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找到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分析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发展着“粗放型”的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单一。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以长久维持的,也不能够给经济带来新的养分。所以我们亟需转变,不论是经济增长的方式还是产业结构的重组升级,

中国都需要进行改革,走出与以往不同的道路。只有这样国民财富水平才可能由中低水平向中高水平迈进、社会阶层由“哑铃型”向“橄榄型”提升、生产生活方式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提升。如果转型成功,则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型失败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分析影响因素,寻找跨越“陷阱”的路径,才是解决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

1. 经济增长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经济增长放缓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最直接的表现。国民经济总增长率出现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6.9%。其原因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下降。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出口对经济的影响下降到负值^[11]。虽然投资量仍在不断增长,但由于投资边际效率递减,仅依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必然空间有限,导致经济下行的趋势。但是,这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经济增长放缓迫使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转变传统产业,消除高污染、高耗能、高风险产业,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发展新兴产业,改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因此,加快经济增长是实现跨越“陷阱”的主要途径。经济形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呈现出更稳定、更健康的趋势,更有利于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 人口因素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近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人们悄然变化的生育观念,我国的出生率大幅度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跌落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中叶,我国的新生儿人口为2600多万,而目前这一数字已下降到1600万人左右。1982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而2014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17%,远远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少儿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3.4亿下降到2014年的2.2亿,短短32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减少了1.2亿。根据智妍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运行状态及投资战略报告》显示,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

重。据预测,到202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5亿,约占社会总人口的17%;到2030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3.71亿,约占总人口的25%;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数则将到达4.83亿,约占总人口比重的34%。社会有效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将会加剧社会负担,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人口红利消失,加上中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隐忧不断加剧。由于老龄化的趋势,消费品的需求量将会大大下降,以扩大内需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战略或将难以实现。因此,人口问题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8]。

3. 产业结构因素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始终处于低端水平,以粗放型为主。与世界产业结构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自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失衡,产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第二产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已成为振兴经济的主要因素。由于国际间竞争态势越来越激烈,劳动型密集产业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一些产业已经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大量企业“走出去”,也削弱了部分增长势头。我国的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调整,人力和物力需要重新配置。而要素的配置效率也是克服“收入陷阱”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自十八大以来,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初步进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这个差距继续拉大,服务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三、实证分析

1. 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通过以上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速率、人口因素和产业结构对于中国能否跨越“陷阱”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据此分析,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经济新常态下,GDP增长率的适当减缓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二:由于贯彻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降低出生率将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未来的低出生率将导致我国长期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这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不利于我国顺利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在短期给市场带来阵痛,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负面影响。但是,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转型将会淘汰高污染、高耗能、高风险的企业。同时,改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布局,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积极的影响。

因此,本文选定以下指标进行分析(表1)。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	居中	变量符号
人均国民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	Y
GDP 增长率	GDP 增长速率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g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代表人口要素;表明人口自然增长趋势	bir
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	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代表产业结构调整	Ind_2
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	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代表产业结构调整	Ind_3

计量模型选择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g_{it} + \beta_2 bir_{it} + \beta_3 ind2_{it} + \beta_4 ind3_{it} + \mu_{it}$$

其中,数据选取于 2005—2015 年,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表示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

2. 计量过程

在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表2),以防止出现自相关现象,造成错误分析。

表2 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1/VIF
Ind_2	3.03	0.330 183
Ind_3	2.92	0.342 949
bir	1.26	0.793 252
g	1.03	0.974 674
Mean VIF	2.06	

由于变量最大的 VIF 值为 3.03,远小于 10,故不必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

3. 计量结果分析

在回归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判定此面板数据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如表3所示,本文当中的数据 F 统计量的概率为 0.000 0,检验结果显示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 模型。

表3 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检验

Fixed - effects (within)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341	
Group variable: province					Number of groups = 31	
R - sq: within = 0.685 5					Obs per group: min = 11	
Between = 0.715 5					Avg = 11.0	
Overall = 0.465 7					Max = 11	
					$F(4\ 306) = 166.77$	
Corr(u_i, xb) = -0.9271					Prob > F = 0.000 0	
Y	Coef	Std. Err.	t	p > t	[95% Conf.	Interval]
g	-0.368 727 1	0.092 982 9	-3.97	0.000	-0.551 693 9	-0.185 760 3
bir	-0.021 571 8	0.040 130 7	-0.54	0.591	-0.100 538 7	0.057 395 2
Ind_2	0.210 361 5	0.013 523	15.56	0.000	0.183 751 7	0.236 971 2
Ind_3	0.317 143 7	0.015 338 8	20.68	0.000	0.286 960 8	0.347 326 5
_cons	-20.965 04	1.243 2	-16.86	0.000	-23.411 34	-18.518 73
Sigma_u	1.366 096 3					
Sigma_e	0.424 537 82					
Rho	0.911 929 33 (Fraction of variance due to u_i)					
F test that all u_i = 0			$F(30\ 306) = 11.86$		Prob > F = 0.000 0	

如表4所示,LM 检验得到的 P 值为 0.000 0, 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也优于混合 OLS 模型。

表 4 LM 检验

Breusch and Pagan Lagrangian multiplier test for random effects		
$Y[\text{province},t] = \alpha + u[\text{province}] + e[\text{province},t]$		
Estimated results:		
	Var	Sd = sqrt(var)
Y	0.779 743 6	0.883 030 9
e	0.180 232 4	0.424 537 8
u	0.059 632 8	0.244 198 4
Test: Var(u) = 0		
Chibar2(01) = 32.54		
Prob > chibar2 = 0.000 0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当模型中加入了各省市变量(个体效应变量)的时候,模型将显著优于截距项为常数假设条件下的混合 OLS 模型。但是无法区别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这需要进行 hausman 检验来找出模型最终性质。

如表 5 所示,hausman 检验的 P 值为 0.000 0,故认为随机效应模型基本假设得不到满足。此时,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表 5 hausman 检验

Coefficients				
	(b)	(B)	(b - B)	Sqrt(diag(v_b - v_B))
	fe	re	difference	S. E.
g	-0.368 727 1	-0.839 496 6	0.470 769 5	0
bir	-0.021 571 8	0.032 193	-0.053 764 8	0.033 418
Ind_2	0.210 361 5	0.095 515 7	0.114 845 8	0.008 606 1
Ind_3	0.317 143 7	0.145 690 1	0.171 453 5	0.011 346 2
b = consistent under Ho and Ha; obtained from xtreg				
B = inconsistent under Ha, efficient under Ho; obtained from xtreg				
Test: Ho: difference in coefficients not systematic				
$Chi2(4) = (b - B) [(v_b - v_B)^{-1}] (b - B)$				
= 230.17				
Prob > chi2 = 0.000 0				
$v_b - v_B$ is not positive definite				

表 6 回归分析

Random - effects GLS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341		
Group variable: province				Number of groups = 31		
R - sq: within = 0.587 5				Obs per group: min = 11		
Between = 0.713 4				Avg = 11.0		
Overall = 0.530 8				Max = 11		
				Wald chi2(4) = 372.46		
Corr(u_i, xb) = 0 (assumed)				Prob > chi2 = 0.000 0		
Y	Coef.	Std. Err.	z	p > z	[95% Conf.	Interval]
g	-0.839 496 6	0.103 097 7	-8.14	0.000	-1.041 564	-0.637 428 9
bir	0.132 193	0.022 219 6	1.45	0.147	-0.011 356 6	0.075 742 6
Ind_2	0.095 515 7	0.010 431	9.16	0.000	0.075 071 4	0.115 960 1
Ind_3	0.145 690 1	0.010 321 9	14.11	0.000	0.125 459 6	0.165 920 7
_cons	-8.698 972	0.926 839 8	-9.39	0.000	-10.515 55	-6.882 4
Sigma_u	0.244 198 36					
Sigma_e	0.424 537 82					
rho	0.248 609 8 (fraction of variance due to u_i)					

由此可知,经济增长率与人均国民收入成反比,这也验证了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的放缓进行产业升级改造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生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与人均收入成正比,这代表着我国继续通过改造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来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以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4. 计量结果分析

通过计量检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放缓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比较显著,符合假设一。这表明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消除高污染、高耗能、高风险的企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实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积极作用。其次,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并且结果非常显著。这表明我国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由于中国多年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些年来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渐渐开始凸显。当前我国呈现着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时存在的局面,这种状况会造成我国的有效劳动力严重供给不足、缺乏社会创新能力、社会消费能力下降,这将导致我国社会养老负担压力上升。此外,随着人口的“刘易斯拐点”临近,不合理的人口结构可能严重阻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在第一产业中,农业的内部发展极其不合理,相较于国外来说,我国农业规模经济水平低下,现代化程度低,这些使得产值低效;在第二产业中,有许多传统的制造业,它们污染大、能源消耗量高,高新技术含量高、企业附加值高的企业占比较小;在第三产业中,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传统的服务业升级尚未完成,新兴服务业发展尚不成熟。去库存、去能耗、去杠杆的政策尚未完全实施,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支持力度不足。因此,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如何重建第二产业,如何改善产业结构,是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四、经济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中等收入阶段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

增加中等收入者数量,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实现共同繁荣。但是,由于经济本身内外部因素的差异,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变历程完全不同。在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有信心,有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如何稳定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使其更加理性,不断推进改革进程使得中国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特别在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未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有必要调整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和质量,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重塑产业结构,激发产业活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实现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1. 推动供给侧改革,刺激经济增长

2016年12月14日到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矛盾和问题的核心方法,也与是否可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息息相关。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发展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面对的现实状况跟以往任何阶段都不一样。首先,供给端呈现了新常态。目前,中国的自然资源、人口、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国内需求的拉动效应和投资效应,但是内需和投资的增长空间有限,我们无法依此提供长期而有效的经济增长,所以也迫使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国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其次,需求端呈现新常态。全球市场经济疲软,再加上投资和需求比例失衡,寄希望于外部的需求拉动也是渺茫。因此,在新常态下,中国想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得不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减少低端无效的供给,增加高端有效的供给。鼓励产品创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从而使供给体系能够有效匹配需求,创造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供需体系。二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的消费模式,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改变和创造了中国人新的消费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观念。未来,是信息经济发展的时代。鉴于此,我们应当不断地降低国内互联网的应用门槛,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无障碍地使用信息化平台;建立智慧城市,完善城市信息化平台,

将信息产业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得信息产业做到真正的惠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新的经济模式,势必会对现有的法律和监管体系构成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国政府要尽快完成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加强对互联网产业的质量监督,完善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9]。三是要打造属于中国的国民品牌,创造品牌优势。这些都离不开自主创新的能力。采用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手段,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流程效率,打造国产品牌国际竞争力,让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品牌在互联网电商的推动下,走出国门,走上国际舞台。

2. 调整人口结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以人口为基础的,合理的人口比例决定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的红利;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我们已经无法继续依靠人口红利来创造下一个经济奇迹。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是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7%以上。根据这个标准,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的15.5%,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1%。在总人口中,16岁以上至60岁以下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67%,0到14岁低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6.5%。这些表明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两难境地。有效劳动人口的不断减少,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结构的不平衡都是阻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因此,必须寻找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一是提高劳动人口的比重。为了适应未来经济新常态,我们必须确保稳定的人口增长率。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大力推行二胎政策,以提高人口的增长率。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八零后、九零后,婚姻和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丁克一族”屡见不鲜,结婚生子的意愿明显下降;尤其是一线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压

力大,教育资源紧缺,生育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巨大,使得年轻人的无力承担孩子带来的压力而选择少生育或者不生育。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经济分布不均,造成人口分布失衡。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发达,每年大量人口流入,创造了一个个大型城市,甚至超大型城市;而二三线城市人口流失严重,这就造成了经济的进一步失衡。这就要求政府在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也出台相匹配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给二胎家庭一定的补助或者适当的减税政策,另外要积极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保证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二是不断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人口的综合素质。继续加强和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普及学校教育,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减少“填鸭式”教育培养模式。要因材施教,根据个人特点培养专业人才。除此之外,还要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倡导全民健身,增强体育锻炼的意识,组织多种多样可供全民参与的体育活动,例如现在大城市常常会举行的城市马拉松比赛等。三是要聚焦老龄化问题,积极改善人口结构。虽然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减少外流的中青年人,防止潜在劳动力的流失。近年来,中国外流人员趋势上涨,特别是中青年的海外移民,这对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些群体恰恰是适龄劳动力,如果这样的劳动力外流,必定会使得中国的人口更趋于失衡,而国民经济也会因为缺少适龄劳动力而缺乏动力。所以国家需要增强实力,减少适龄劳动力移民的情况。特别是对于一些中青年骨干,高层次人才更是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尽可能的使他们留在国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

从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来看,加快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它们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不可或缺的因素。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对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实施传统产业的振兴战略。资源型企业,例如煤炭、钢铁、建材等行业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整合,小企业将被兼并和收购,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对于私营企业

而言,它们需要进行优胜劣汰,留下在资源整合方面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需要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进行整合和战略性的规划。对于整合后的第二产业,有必要简化和实施统一的国家环境保护和安全标准,使得东西部地区得到均衡的发展。同时,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蓝图下,可以让部分的传统企业“走出去”,不仅仅可以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使得企业拓展了海外市场,赢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其次,要大力发展新兴行业。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带来最突出的成果便是新兴行业的出现,而新兴行业的兴起需要国家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对于政府来说,有必要制定支持性的政策,为我国的新兴行业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和保护;制定吸引投资和人才的优惠政策和条件。着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形成产业园区,通过产业集群效应和协同作用使得传统企业赢得新的活力,新兴产业拥有更多的支持,在良好健康的产业发展氛围。最后,要推进第二产业的绿色发展和第三产业的信息化发展。第二产业例如能源行业,大量的引入数字化平台管理模式,大数据和云计算,使得资源进行绿色开采,集约式输送等。第三产业应当引入更多的互联网信息要素,通过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完善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提供更多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提高第三产业的服务质量。

五、结 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红利和制度优势,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2010年以来,我国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也面临着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严峻考验——“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国家不容忽视的经济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就业率下降,老龄化与少子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经济迎来了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投资消费与出口、自然资源以及人口红利等传统的优势已不再明显。我们迫切需要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的现实路径。

本文基于2005—2015年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发现经济增长率、人口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因素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极其重要意义。其中,经济发展放缓对于提高人均收入有着正向的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第二产业对GDP贡献率与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产生负向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改善人口结构,积极提高人口素质和质量;对第二产业进行绿色化建设,对第三产业实施特色化建设,新老产业结构,借助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协同效应,激发经济的新活力和新动力,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参 考 文 献

- [1] 辜胜阻,曹誉波,王敏,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J]. 商业时代,2012(14):4-5.
- [2] 马晓河.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3] 周文,赵果庆,徐波,等.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J]. 经济理论与管理研究,2017(1):26-38.
- [4] 金立群.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 人民日报,2015-8-11(07).
- [5] 张楠. 我国“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及跨越路径——基于经济新常态背景的实证分析[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7):93-97.
- [6] 杨文进,沈亦君. “发展陷阱”的形成原因分析——兼论中国经济落入发展陷阱的必然性[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5):45-53.
- [7] 李炜光. 中国: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J]. 中国储运,2015(6):40.
- [8] 马岩. 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 经济学动态,2009(7):42-46.
- [9] 蔡昉. 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13-18.
- [10] 楼继伟. 中国经济的未来15年:风险、动力和挑战[J]. 比较,2010(51):1-22.
- [11] 张荣,张桂文.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分析及跨越路径探寻[J]. 经济问题探索,2017(7):31-37.

A Study of the Path to 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China under the New Normal

CHANG Qing-qing

(School of Busines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brought huge opportunitie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reported by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China's per capita income in 2010 topped \$ 4 035, which marks the official entry of China into the rank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However, the increased income has not accelera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ead, China's economy is faced with the “middle-income trap”. Especially the economical growth has slowed down in recent years with an economic downturn and thu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Besides, there are some adverse factors as the insufficient growth momentum, the imbalanced population ratio and the uneve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China to overcome “the middle-income trap”. Using the economic analysis model, the paper makes a regression analysis on economic growth, demographic facto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inds that though a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reasing of per capital income, the imbalance of demographic factor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has a negative on that. Accordingly it puts forward a new path to 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Key words: the middle-income trap;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编辑 高婉炯】

=====

(上接第 31 页)

The Spatial Ideology Awareness and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Fringes

——A case study of Xi'an “Daobei” Area

LAN Kai-lun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Daobei”, the northern area of Xi'an section of Longhai Railway, used to be regarded as a chaotic and disorderly urban fringe area. This naming from the dimension of space not only indicates its location, but also develops into a cultural label decades after, which refers to a kind of life state or a sort of social stratum that people keep away from. Due to the geological location according to Longhai Railway, one of the traffic arteries of China, “Daobei” is also used in areas along the railway of Henan province, as well as Xi'an, Shaanxi, thus forming the similar environment of fringe communities. Rather than criticizing the formation of this dark space at a hegemonic standpoint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custom, this paper tends to find in another way the main group of residents living in Daobei along with the historic changes of spac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changes of Daobei at Xi'a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te of its main residents, the working class, hence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Daobei of Xi'an; working class; gentrification; socialist urban space

【编辑 高婉炯】